

陳荊和教授的東亞史研究

周佳榮

一、東亞研究的倡導者

香港是亞太區內的大都會，在國際華人社會網絡中佔有關鍵位置。本地學界於東亞研究方面，既能較充份掌握中國內地、香港、澳門、臺灣以至海外華人的文獻和著作，又可以參考歐美和日本的資訊及成果，其表現往往別樹一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研究條件尚未成熟的情形下，有一批外地學者來港，居留長達一、二十年以上，他們一方面致力開拓自己的研究空間，一方面為本地培訓接班人才，成績有目共睹，功不可沒。史學家陳荊和（Chingho A. Chen, 1917—1995）在港從事教研工作近二十年，是其中的表表者。

陳荊和以研究東南亞華僑史著稱，而於整理越南史料方面成績最為可觀；同時精通日本歷史與文化，為本地的日本研究奠定基礎。他一生勤於著述，分別以中文、越南文、日文、英文發表，包括專書、史料集多種，及論文逾六十篇。要全面評論陳荊和的學術成就，先決條件是通曉上述幾種語文，何況他的東亞研究，涉及面既廣，課題又專深，這對一般學者來說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弟子之中，大抵於其學問有所偏重，或專注東南亞華僑，或著眼中日關係，要發揚光大，非加倍努力不可。

本文主要綜述陳荊和的生平事蹟和著述概況，初步探討他在學術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並藉此說明他對本地和海內外史學界的貢獻，希望學界珍惜他以半個世紀時間辛勤開拓的研究領域。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學界所指的東亞，僅為中、日、韓三國，並不包括東南亞在內；但古代的東亞世界，涵蓋範圍實及於東南亞地區。隨著二十世紀的開展，中、日、韓諸國不但交往頻繁，還加強與東南亞地區聯繫，一個廣義的新東亞時代已宣告來臨。所以本文所說的「東亞史」，包括「東南亞史」在內；這與陳氏提倡的東亞研究，其定義是一致的。

二、生平概況及教研成績

陳荊和，字孟毅，號蒼崖。生於臺灣臺中市，原籍福建漳州漳浦縣，其家族於1748年移居臺灣，時為清朝乾隆十三年。陳荊和在日本東京接受小學和中學教育後，入慶應大學文學部史學科，專攻東洋史，師從松本信廣（1897—1981），於1942年畢業。¹松本信廣是東亞民族史家，著有《印度支那的民族與文化》、《古代文化論》、

¹ 《華僑華人百科全書·著作學術卷》（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99年），林在森〈陳荊和〉條，頁33。

《東亞民族論考》等；戰後主要從事東亞古代船舶的研究，參與《亞洲歷史辭典》的編寫。²

1943年至1945年間，陳荊和在越南河內的法國遠東學院進修東南亞史及越南語。1954年至1955年，在法國巴黎大學高級中國研究所從事遠東各國近代史研究。他獲慶應大學頒授文學博士學位，是在1966年。日本和法國都是漢學研究的重鎮，越南自古以來，與中國、日本、朝鮮同為東亞文化圈的成員，陳氏的留學經歷，已模鑄了日後的研究路向。

從1940年代中至1960年代初，陳荊和先後任教於臺灣大學、越南順化大學、西貢大學及大叻天主教大學。1962年應聘來港，在史學大師錢穆（1895—1990）創辦的新亞書院擔任教職；又在新亞研究所設立東南亞研究室，致力研究東南亞歷史、社會和文化。1963年香港中文大學成立，新亞書院是三個成員學院之一，該校重視人文學科，文史哲研究蜚聲士林。任教於歷史系的學者，均為一時之選，學術史有牟潤孫，歷史地理有嚴耕望，社會經濟史有全漢昇，隋唐史有孫國棟，秦漢史有蘇慶彬，中西交通史有王德昭，加上陳荊和的東南亞史及日本史，連同外籍講師和交換學人講授的科目，格局甚見恢弘。書院以「新亞」為名，歷史系更有「新亞史學」的氣象。陳荊和融會中國史與亞洲史，王德昭貫通中國史與西洋史，二人的聘任相信並非純然巧合，而是出於一種邁越世俗時流，蘊含卓識遠見的學術安排。

香港中文大學於1967年成立中國文化研究所，其下設「中國與東南亞關係組」，由陳荊和主持，從事東南亞華僑資料的搜集和整理。1971年，陳氏又在社會人文學科研究所成立東亞研究中心，與美國南伊利諾大學越南研究中心合作，進行「越南史料整理計劃」。³

1963年至1977年間，陳荊和除了在中文大學歷史系任教外，曾休假離港，到慶應大學和南伊利諾大學等校講學。1977年中文大學成立日文組，聘請陳氏為日本研究講座教授，兼中國文化研究所副所長、所長，至1981年退休。其後續獲日本創價大學聘請，擔任教育學部、教育與文化研究中心特任教授；1986年起，出任亞洲研究所所長，任內曾到北京大學講學，1993年因健康緣故正式退休。⁴晚年定居越南，享年七十八歲。

三、確立東亞史研究的方向

1940年代後期，陳荊和開始在臺灣出版的刊物上發表文章，其〈順化城研究旅行雜記〉載於《臺灣文化》第3卷第5期（1948年），〈「字喃」的形態及其產生年代〉載於《人文科學論叢》第1輯（1949年）。1950年代開始，陸續有多篇論文在

² 嚴紹盪《日本的中國學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年），〈松本信廣〉條，頁417；日本歷史學會編《日本史研究者辭典》（東京：吉川弘文館，1999年），頁306。

³ 參《中文大學校刊》1976年冬季號，〈陳荊和教授專訪〉。

⁴ 參《創大アジア研究》第15號（1994年），〈陳荊和前所長退職紀念號〉。

《文史哲學報》、《大陸雜誌》及《學術季刊》上刊登。⁵《中菲文化論集》、《中越文化論集》等專書或特刊，亦載有他的著作。⁶

1962年陳荊和來港以前，在研究方面有下列幾項值得注意的事情：

第一，是兼顧歷史知識的普及工作，陳氏曾編著華僑初級中學歷史教科書《東南亞史》，1955年至1956年間，由臺北正中書局分別出版菲律賓版、印尼版和越南版。

第二，是拓展研究領域，他在新加坡出版的《南洋學報》上發表〈鄭懷特撰《嘉定通志》城池志註釋〉（第12卷第2輯；1957年）及〈清初華船之長崎貿易及日南貿易〉（第13卷第1輯；1958年），後者的視野已擴寬到日本。

第三，是開始在香港的《新亞學報》上刊登論文，計有〈十七、十八世紀之會安唐人街及其商業〉（第3卷第1期；1957年）、〈承天明鄉社與清河庸〉（第4卷第1期；1959年）及〈清初鄭成功殘部之移殖南圻〉上（第5卷第1期；1960年），末後一篇的下半於《新亞學報》第8卷第2期（1968年）續完。

第四，是編印東南亞史料集和目錄，其《十七世紀廣南之新史料：〈海外記事〉》由臺北中華叢書委員會於1960年出版，《阮朝硃本目錄》第一集（嘉隆朝）、第二集（明命朝）及《黎崩〈安南志略〉校定本》，則由越南順化大學於1960年至1961年出版。

以上幾點，說明了陳荊和的研究方向及志趣早見端倪，在來港任教之前，已初具規模。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陳荊和於順化大學任教期間，對明清之際朱明遺民流寓越南建立的華裔社區「明香社」（意即維持明朝香火，後來改稱「明鄉社」）有開創性的研究，其成果初見於《新亞學報》上。來港後，更出版《承天明鄉社陳氏正譜》（香港：新亞研究所，1964年）一書。

四、來港任教及開展研究

1960年代，陳荊和一方面在新亞書院歷史系任教，一方面在新亞研究所主持東南亞研究室，進行兩項出版計劃：其一是「東南亞研究專刊」，其二是「東南亞史料專刊」。

「東南亞研究專刊」方面，計有鄭懷德《艮齋詩集》（1962年）、陳荊和《十六

⁵ 陳荊和〈交趾名稱考〉，《文史哲學報》第4期（1952年）；〈菲律賓華僑大事誌〉，《大陸雜誌》第6卷第5期（1953年）；〈林鳳襲擊馬尼拉事件及其前後（1565—76）〉，《學術季刊》第2卷第1期（1953年）；〈安南譯語考釋〉，《文史哲學報》第5—6期（1954年）；〈八聯市場之設立與初期中菲貿易〉，《大陸雜誌》第7卷第7—8期（1954年）等。

⁶ 陳荊和〈五代宋初之越南〉，《中越文化論集》2（1956年）；〈西屬時代的菲島華僑零售商〉、〈華人歷史上的人口及居留地〉，《中菲文化論集》2（1960年）；〈越南陳朝史略〉，《臺灣陳大宗祠德星堂重建50周年慶祝紀念特刊》（1961年）等。

世紀之菲律賓華僑》(1963年)及上文提到的《承天明鄉社陳氏正譜》;同系列的出版物,還包括呂士朋著《北屬時期的越南——中越關係史之一》(1964年)。*《十六世紀之菲律賓華僑》*是陳荊和的代表作,收集歷年發表關於菲律賓華僑史研究的論文,探討西屬菲律賓時期中菲貿易的出現,內容並及西屬初期對華僑的管治以至菲華的動態。其後此書並有英文版在日本出版。⁷學術界公認此書是有關方面的權威著作。「東南亞史料專刊」方面,整理出版越南人潘叔直(養浩)輯《國史遺編》(1965年)及宋福玩、楊文珠輯《暹羅國路程集錄》(1966年)兩種。

及至1970年代,陳荊和編校的史料集,均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計有:越南阮朝(1802—1945)翼宗原撰《嗣德聖製字學解義歌譯註》(1971年),與陳育崧合編《新加坡華文碑銘集錄》(1972年),以及《阮述〈往津日記〉》(1980年)。阮述在越南嗣德朝(1848—1883)晚期曾兩次赴華,《往津日記》是研究當時中越關係的重要資料,此書除陳荊和的解說及註釋外,還有著名學者饒宗頤的跋文。

在香港任教期間,陳荊和續有中文論文刊載於港、臺學報;⁸又出席學術研討會,以英文發表其研究成果。⁹日文論著更多達十餘篇,分別見於日本的《史學》、《三田評論》、《亞細亞經濟》、《民族文化》、《東南亞——歷史與文化》等學報,較重要的有〈十七、十八世紀東南亞的華僑自主政權〉及〈《大越史記全書》的撰修與傳本〉等;¹⁰另有〈《大越史略》的內容與編者〉一文,載於《山本達郎博士古稀記念論文集——東南亞、印度的社會與文化》(1980年)。¹¹

陳荊和主持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期間,於1979年舉辦「中日文化交流國際研討會」,是香港地區首次以中日歷史關係為主題的一個大型國際研討會,共有十個國家和地區的學者參加,包括來自日本、韓國、臺灣、馬來西亞、澳洲、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和香港的學者六十多人。大會討論了中日兩國二千年來文化交流的情況,並將提交論文結集為《中日文化交流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三卷,包括考古、美術、文學、語言學習、經濟及思想六方面,於1985年出版。¹²

⁷ Ching-ho Chen,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Philippines*, Tokyo: The Centre for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 1968.

⁸ 陳荊和〈十七、八世紀越南之南北對立〉,《南洋大學學報》第2期(1968年);〈河仙鄭氏世系考〉,《華崗學報》第5期(1969年);〈元世祖忽必烈的日本出師〉,《華學月刊》第11期(1972年)。

⁹ Chingho A. Chen, "On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Duong-thuong Hoi-quan' of Faifo(Hoi-an), Central Vietnam", *Southeast Asian Archives*, Vol.II (1969); "Mac Thien Ti and Phraya Taksin, A Survey on their Political Stand, Conflicts and Background", *Proceedings, Seventh IAHA Conference*, Vol.II (1979).

¹⁰ 陳荊和〈十七、十八世紀の東南アジアにおける華僑の自主政權〉,《民族文化》第10卷第1—2號(1974年);〈《大越史記全書》の撰修と傳本〉,《東南アジア——歴史と文化》第7號(1977年)。

¹¹ 陳荊和〈《大越史略》——その内容と編者〉,《山本達郎博士古稀記念論文集:東南アジア・インド社會と文化》(1980年)。

¹² 黃愈軒〈香港研究日本史及中日關係史的概況〉,載周佳榮、劉詠聰主編《當代香港史學研究》(香

五、晚年在日本發表成果

1980年代，陳荊和任教於創價大學，在學術界顯得非常活躍，發表論著逾十篇，例如〈關於《大南寔錄》與阮朝硃本〉載《稻·舟·祭——松本信廣先生追悼論文集》（1982年），〈東南亞華僑史研究的回顧〉載《第一回國際近代日本華僑學術研究會論文集》（1988年）。¹³其餘大多刊於《創大亞細亞研究》，如〈《校合本·大越史記全書》的刊行及其體裁〉（第8號；1987年）、〈關於阮朝初期的「下洲公務」〉（第11號；1989年）。¹⁴

除了繼續一向以來的東南亞史研究外，陳氏也有文章涉及香港問題，例如〈新界租約期滿與香港的將來〉、〈嗣德時代越南的近代化志向與香港〉；¹⁵此外，還論述了一些當代政治事情，例如〈中國之統一：分析與展望〉、〈西沙群島與南沙群島——歷史的回顧〉。¹⁶這是陳氏晚年著述的特色之一。

陳荊和早於1970年代已全面進行《大越史記全書》的校勘工作，但因卷帙浩繁，赴日本後繼續完成，《校合本·大越史記全書》三冊最終由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附屬東洋學文獻中心於1984年出版。《大越史記全書》乃越南黎朝（後黎朝，1428—1789）史官吳士連等撰修的編年體正史，以《大越史記》及《史記續編》兩種著作為基礎編成，1665年范公著奉命續修《大越史記全書》，增加《本紀實錄》及《本紀續編》；1697年黎僖撰成《本紀續編追加》，又增1662年至1675年黎玄宗、黎嘉宗兩朝實錄，成為《大越史記全書》的最後修訂本，至此全書遂告完成，頒行天下。除最初的刻本外，西山朝（1778—1802）、阮朝均有版刻或複刻；1885年日人引田利章在日本以活字印刷，成為通行本，但錯漏頗多，引起不少疑問。陳氏編校的《校合本·大越史記全書》，以不同版本互校，並加標點和註解，對研究者最稱便利。¹⁷

陳荊和另編訂《校合本·大越史略》，1987年由創價大學亞洲研究所出版。《大越史略》又名《越史略》，是越南最早的編年體史書，撰者不詳（有人認為作者是胡宗鶯），大約是陳朝昌符年間（1377—1388）的著作。共有三卷，敘事自傳說時

港：三聯書店，1994年），頁358—359。

¹³ 陳荊和〈《大南寔錄》と阮朝硃本について〉，《稻·舟·祭——松本信廣先生追悼論文集》（1982年）。

¹⁴ 陳荊和〈《校合本·大越史記全書》の刊行とその體裁〉，《創大アジア研究》，第8號（1987年）；〈阮朝初期の「下洲公務」に就いて〉，《創大アジア研究》第11號（1989年）。

¹⁵ 陳荊和〈新界租約の滿期と香港の將來〉，《創大アジア研究》第3號（1981年）；〈嗣德時代ベトナムの近代化志向と香港〉，《創大アジア研究》第12號（1991年）。

¹⁶ 陳荊和〈中國の統一：分析と展望〉，《自由世界》1982年5月號、6月號〈西沙群島と南沙群島——歷史的回顧〉，《創大アジア研究》第10號（1989年）。

¹⁷ 周佳榮〈越南漢文史籍解題〉，載氏著《亞太史研究導論》（香港：利文出版社，1999年），頁84—85。

代起，而於李朝（1010—1225）史事記述特詳，與《大越史記全書》同為考察越南李朝及前此史事的基本材料。但《大越史略》在越南國內已失傳，流傳於中國，收入《四庫全書》，此外亦見於其他叢書載錄。¹⁸陳氏編校的《校合本·大越史略》是現行最完整的版本。

六、默默耕耘的先驅

陳荊和在學術界的活動，大致上可以分為三個時期：（一）前期——從 1945 年至 1962 年，主要活動於臺灣，其次在越南，這時期奠定了他的研究基礎和確立了發展方向；（二）中期——從 1962 年至 1981 年，主要任教於香港，活動則遍及東亞和東南亞多國，這時期是他從事史學研究的高峰期，成就特多，並以中英文撰寫其代表作；（三）後期——從 1981 年至 1995 年，主要活動於日本，晚年在越南定居，以完成《大越史略》和《大越史記全書》的校合本為最大成就，日文著作亦多。

陳荊和早年對臺灣史學界的影響，史家曹永和在〈百年來的臺灣學術發展〉一文中指出：「本地研究者也漸受注目，如今日許多臺灣史資深學者的共同老師楊雲萍；日治時期畢業自慶應大學，專研東南亞史——特別是越南史的陳荊和。雖然臺灣學術對陳荊和多所忽略，但其研究在只重視中國史研究的臺灣史學界，應該有特別的地位。」¹⁹這番話大概也適合用於香港史學界，本地學者對陳荊和的大量著作多所忽略，對他在東南亞史和華僑史方面享有國際聲譽，幾乎亦茫無所知。

明史專家趙令揚回憶他輯錄《明實錄中之東南亞史料》的情形，謂「當時《明實錄》一書，絕不易見，幸新亞書院圖書館有錢穆院長私人收藏之梁鴻志於 1940 年影印江蘇國學圖書館藏嘉業堂傳鈔本。……1959 年整個暑期，在新亞書院圖書館抄錄有關東南亞之資料，揮汗工作，可謂艱辛，但如果沒有圖書館何家驊先生及東南亞研究室主任陳荊和教授在行政上及精神上之鼎力支持，有許多技術上之困難，是難以克服的。」又說：「有關明代和東南亞之關係，筆者和陳學霖、陳璋之《明實錄中之東南亞資料》上、下兩冊，於 1967 年及 1976 年出版，對明代和東南亞之研究，予以很多的方便。但明代和中南半島之研究，已故之陳荊和教授，應為這方面的專家，陳教授在學術上的成就，早已肯定，其對年輕一代學者的鼓勵和支持，確為一代之典範。」²⁰

陳荊和在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講授日本史和東南亞史，相對於為數眾多的中國史科目來說，是「冷門」科目，真正有興趣的學生不多；他的著作常令學生摸不著頭腦，至於用日文發表論著一事則更少人知道了。²¹陳氏在中大研究院亦開研習班，

¹⁸ 同上註，頁 85—86。

¹⁹ 載莊永明總策劃《學術臺灣人》（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 年），頁 11。

²⁰ 趙令揚〈近五十年香港地區之明史研究〉，載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編《文化的饋贈——漢學研究國際會議論文集》史學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頁 150—151。

²¹ 周佳榮〈師門十年記——陳荊和教授與我〉，載《與中大一同成長》（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0 年），頁 202—204。

在他指導下撰寫碩士論文的研究生並不算多。²²

但是，必須一再強調，香港學界對東南亞史和華僑史的研究，以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最盛，成就斐然，在國際學術界評價甚高。這與陳荊和在香港從事教研工作，實有很大關係。1980 年代開始，由於中國內地大力推行學術研究，香港本身雖然未能再創高峰，但發揮了溝通中外學界和促進學術交流的作用。踏入 1990 年代以後，隨著亞太研究在大專院校的開展，東南亞問題和海外華人社會研究，呈現了一番新的局面。²³

陳荊和自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退休後，東南亞史一科停開十餘年，始由梁元生再講授；日本史初由譚汝謙接手，近年則由陸國燊講授。中國文化研究所自陳氏離開後，有關的研究計劃和研究中心均停頓，近年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鄧聰致力於東亞考古，在相當程度上，實踐了陳荊和開創的東亞史研究格局。上述各人，均為中文大學畢業生。

劉家駒是陳荊和來港初期的入室弟子，在香港浸會學院講授東南亞史及東南亞華人史多年，著有《菲律賓菲化運動之研究》（香港：學津書店，1983 年），傳陳氏一門之學。其後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常設此兩科，保留了這一學術傳統。現時在浸會大學歷史系講授中日關係史的林啟彥，亦是中文大學畢業生，受教於陳荊和，譯有日人宮崎滔天的自傳《三十三年之夢》（香港：三聯書店，1981 年），又與譚汝謙合譯實藤惠秀著《中國人留學日本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2 年）。周佳榮早年在中文大學歷史系跟隨陳荊和研習日本史，其後又在日文組擔任陳氏講授日本文化與社會一科的助教，著有《近代日本文化與思想》（香港：商務印書館，1985 年；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 年）及《亞太史研究導論》（香港：利文出版社，1999 年），現時亦在系中講授二十世紀日本、近代日本與西方、近代亞洲（1800—1945）等科。

然而陳荊和對東南亞史料校訂之精，對華僑史鑽研之深，對日本歷史文化認識之廣，對東亞史整體識見之博，學界如欲掌握其學問神髓，恐怕仍需俟以時日。古代中國曾是研究東南亞歷史文化的重鎮，在今日而要恢復其領導地位，必須重視先驅學者的研究成果，陳荊和的論著散見於不同刊物，他編校的史料集流佈於各處，若能加以系統整理，將可發揮更大作用。

——原載《香港中國近代史學報》第 3 期（2005 年）

²² 例如：劉家駒〈菲律賓菲化運動之研究〉（1968 年）、曹仕邦〈越南歷朝（從丁朝至黎朝）佛教與政治的關係〉（1968 年）、李朝津〈中日外交之序幕：日本的出兵臺灣 1870—1874〉（1976 年）。

²³ 周佳榮〈香港的東南亞史及海外華人史研究〉，載周佳榮、劉詠聰主編《當代香港史學研究》，頁 376—379。